

南京大屠殺歷史 記憶的塑造

張連紅 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
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

人類創傷的歷史似乎總是伴隨著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作為 20 世紀人類三大悲劇之一的南京大屠殺，幾乎從發生開始，在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間就展開了掩蓋與揭露、遺忘與記憶的較量。由於戰後冷戰的影響，在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的形成過程中，政治不可避免地充當了重要的角色，即便如此，戰爭倖存者的記憶傳承、戰爭記憶場域的構造以及社會自身的反思，不斷傳承形塑著南京大屠殺的創傷記憶，並最終由南京記憶延伸而成為世界的記憶。

一、歷史記憶的傳承：倖存者、 家族與村莊

倖存者對大屠殺的記憶，人們絕非能從史料中讀出，也很難從影視媒介中去體驗，也許再偉大的歷史學家也不能讓讀者複製移植這種記憶，文字之於記憶確有無能之力。1938 年 3 月底，即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之後，南京城裡約有 23.5 萬餘人僥倖生存下來。而過了 79 年之後的今天，經歷過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只有一百餘人。隨著歲月的流逝，倖存者通過不同方式傳承著南京大屠殺的記憶。

南京大屠殺對於每個倖存者個人而言，日軍的殘暴、恐怖與喪失人道的惡行永遠也無法從他們的記憶中遺忘消失，每個倖存者都有一個相似而又不同的悲慘記憶，在他（她）們的記憶中那恐怖的一頁永遠也無法

抹掉。家住南京頭條巷的張秀紅老人，在其丈夫去世之後，經過多次猶豫，她還是第一次向筆者講述了她 12 歲時，為保住爺爺的性命而被迫遭受三名日本兵輪姦的痛苦經歷；倖存者張玉英老人儘管晚年精神處於分裂期，但她卻能清晰地講述她的父親被日軍用刺刀刺死，倒靠在她身上的那一幕悲劇；在常志強老人的記憶中，刻骨銘心的痛是，她的母親被日軍刺刀刺得全身鮮血，但在臨死之前還掙扎著解開衣服為同樣受傷不滿周歲的弟弟餵奶，乳房旁邊傷口的鮮血還在不停地往外流，他的父親則被日軍刺刀刺死而僵硬地跪在不遠處的牆角，當時只有 10 歲的常志強不知他的父親已死，一把拉他起來去救媽媽的時候，他的父親卻倒了下去再也沒有起來。

倖存者記憶的內容不僅僅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殘暴與恐怖，使倖存者終身難忘的還有大屠殺之後，她（他）們生存下來的痛苦經歷與一種無望的期盼。因南京大屠殺而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孤兒、失去妻子的丈夫、失去兒女的父母和成千上萬被日本兵糟蹋後心中永留傷疤的婦女來說，他（她）們劫後生存經歷雖然不是戰爭創傷本身，但是這無疑也是戰爭記憶的主要內容。杜秀英老人在其 8 歲時在孝陵衛遭到一名日本兵的強姦，從此之後她再也沒有能夠擺脫惡夢般的陰影，三次嫁人都以失敗告終。在大屠殺中，常志強、姜根福、倪翠萍等人都失去了自己的父母親人，作為大屠殺的孤

兒，他們都有屬於自己永遠無法忘記的生存經歷。

倖存者的悲慘經歷成為其家族口耳相傳的共同記憶。在採訪中我們發現大都倖存者的故事，不僅其第二代耳熟能詳，而且其第三代年輕人也都知曉。2000 年，我在採訪一位 84 歲高齡的韓秀英老人，1937 年 12 月日軍進城時，她已有孕在身，在日軍進城後的一天晚上，她的丈夫肖直剛突然被日軍抓走了，從此之後，她幾乎每時每刻都在期盼她的丈夫回來，兒子生下來後也一直在期盼見到自己的父親，她一直和她的兒子住在一起，終身未再改嫁。在筆者去採訪她的時候，她的兒子、兒媳以及孫子輩都知道她的故事。自從 1985 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建立後，在每年清明時節，都有許多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家屬自發前來祭掃、緬懷先人。從 2015 年 12 月 1 日開始，一些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遺屬家庭開始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的「哭牆」前舉行「家祭」活動，通過上香、獻花、跪拜、誦讀祭文或家信等多種形式，悼念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中遇難的親人。

在 1980 年代以後，當日本右翼不斷美化侵略、否認南京大屠殺之後，倖存者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由於媒體的宣傳，一些倖存者因而成為其所在村莊的（社區、街道）「名人」，其有關大屠殺的記憶為同村居民的互相傳播，一些村莊甚至因此而觸發對大屠殺期間全村歷史的調查，在調查的基礎上

並自發捐資建立遇難者紀念碑，從而使這段歷史擴大而為村莊的共同記憶。如 2005 年 8 月，南京江寧區湯山鎮湖山村在倖存者蘇國寶的宣導下，全村人自發捐資修建了湖山村遇難同胞紀念碑，對在該村被日軍屠殺的 64 位村民進行立碑紀念，並且在每年 12 月 13 日，村民都要舉行悼念儀式以緬懷遇難者。同年 12 月，西崗頭全體村民也自發捐款建立紀念碑，以紀念該村在南京大屠殺期間遇難的 37 位受害者，銘記侵華日軍在該村的燒殺搶劫等暴行。這兩塊紀念碑是目前南京所有 22 塊紀念碑中不是由政府出資建立的。村民自發捐資建立的紀念碑雖然簡樸，但其形成的村莊記憶充分體現了民間記憶的特色。

二、歷史記憶的構造：場域、輿論與影視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歷史記憶的構造主要通過「喚起、重構、固化、刻寫」四個要素來完成。南京大屠殺記憶的建構也離不開這四個主要環節，在這一塑造的過程中，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建立與擴建、社會媒體的喚起、影視文藝作品的傳播，學術研究的深入，相互影響，迴圈推動，從而不斷塑造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

在南京，作為公共記憶的場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和每一處紀念碑隨時都可以帶您緩緩走進創傷歷史的

深處。位於南京大屠殺遺址江東門的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自 1985 年 8 月 15 日建成對外開放後，先後經過三期工程的擴建，已成為世界上著名的博物館之一。紀念館通過設計一些大小相間具有象徵意義的建築將空間進行分割與重組，同時陳列展示了遇難同胞遺骨遺物、圖片、文字等歷史史料，空間和特定實物的有機組合，共同形成了空間象徵建構。紀念館作為一個對公眾開放的公共場所，人們進入這個公共空間，理解空間的象徵意義，社會記憶深受其影響。同時，清明節祭掃親人之時，許多市民自發前來憑弔，每年 12 月 13 日，政府在紀念館舉辦形式多樣的悼念儀式，民間和官方的儀式活動又不斷強化空間象徵，實現對空間的再建構。這一特定空間與儀式的互動強化了受眾的社會記憶。自 2004 年 3 月免費開放之後，每年前往參觀人數持續增長，2014 年全年參觀人數突破 800 萬人次，其中 2014 年 12 月 14 日一天參觀人數突破 10 萬人次。除了南京市政府建立的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外，2006 年 12 月，極具特色的南京民間抗戰博物館的建立，以民間的視角記憶南京大屠殺和南京軍民的抗爭歷史，每年也吸引了數以萬計的市民前往參觀。除了紀念館外，遍布南京城內外的 22 座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碑也成為人們「刻寫」記憶的場域。

由於南京媒體的強勢關注，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南京大屠殺」成為市民日常

生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據研究，自 1986 年至 2004 年，僅南京的主流媒體《新華日報》、《南京日報》和《揚子晚報》共發表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報導達 800 餘篇，其中 90 年代中後期呈迅速上升趨勢，其中有些年分其報導數都在百篇之上。其報導主題最初比較集中在新資料發掘和新人證的發現方面，其主要目的為了揭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真相，90 年代中後期後，其報導主題的範圍在不斷擴大，例如有中日兩國南京大屠殺研究新成果、南京大屠殺有關電影、日本老兵的懺悔和關愛倖存者等各個方面。2005 年之後，由於網路新媒體的興起，南京大屠殺成為南京媒體輿論中頻度最高的主題詞之一。

聲像融合的影視作品在記憶塑造中充當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最早的一部關於南京大屠殺影像的紀錄片是西方傳教士約翰·馬吉（John Magee）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現場偷偷拍攝的，但由於各種原因，一直沒有正式公開發映。在中國，第一部引起全國影響的反映南京大屠殺的電影是 1987 年羅冠群執導的故事片《屠殺血證》，這部電影以一組見證日軍暴行的照片為影片的線索，講述了五個普通的中國人在大屠殺中的命運。該片不但喚起了沉睡於人們記憶中的悲慘歷史，更重要的彌補了幾代中國人關於大屠殺的記憶斷層。其後吳子牛的《南京大屠殺》、牟敦芾的《黑太陽·南京大屠殺》以及陸川的《南京！南京！》、張藝謀的《金

陵十三釵》等，均引起社會巨大反響，吸引了眾多民眾觀看，其中《南京！南京！》票房收入達到 1.72 億元，《金陵十三釵》則達 5.92 億元。除電影外，十餘部南京大屠殺紀錄片也不斷製作播放。進入新世紀以來，南京大屠殺的題材也為西方影視界所關注，例如朗恩·約瑟夫（Rhawn Joseph）的《南京夢魘》（Rape of Nanking）、萊昂西斯（Theodore Leonsis）的《南京》（Nanking）、佛羅瑞·加倫伯格（Florian Gallenberger）的《拉貝日記》（John Rabe）、安妮·皮克（Anne Pick）的《張純如》（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等在歐美國家的上演，推動了南京大屠殺的世界記憶形成。

學界研究的不斷深入，為歷史記憶的塑造提供了強大的學術支撐。學術界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是從 80 年代初才真正開始。1983 年，在民眾強烈呼籲下，南京市組織部分專家學者成立課題組，開始收集史料，研究南京大屠殺問題。1995 年，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 50 週年之際，南京市成立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以進一步推動南京大屠殺史的研究。1998 年 12 月，南京師範大學成立了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這一專門研究機構。2006 年 4 月，南京大學依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成立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由江蘇省和南京市與南京大學共建，國內南京大屠殺研究由此進入了新的

發展階段。除南京地區的學者外，武漢、上海、北京等地的大學和研究院所也有部分學者積極參與了這一課題的研究。另外，自從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出版《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之後，吸引了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英國等許多年輕學者開始研究南京大屠殺。近幾年來，學術界最大的貢獻是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巨大進展。在南京大學張憲文教授的精心組織下，國內外數十位專家學者通力合作，搜集了大量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檔案文獻，以及加害者、受害者和中立第三國人士的日記書信和口述資料，出版了約 4,000 萬字 72 冊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由於史料的不斷挖掘，極大地推動了南京大屠殺學術研究的深入，從而為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的固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歷史記憶的延伸：城市、國家與世界

南京大屠殺的黑色記憶是南京城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任何與南京大屠殺甚至與日本軍國主義相關聯的現實事件，事無巨細無疑都會觸及南京市民敏感的神經。自 1982 年日本發生教科書事件後，美化侵略歷史，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言論卻不絕於耳，日本右翼甚至公開集會叫囂南京大屠殺是 20 世紀世界上最大的謊言，並通過電

影、法庭試圖為南京大屠殺案的戰犯翻案。日本右翼分子的言行，不斷揭開南京市民心中尚未痊癒的傷疤，南京大屠殺的悲慘歷史，成為南京市民生活中揮之不去的陰影。任何同南京大屠殺相關聯的事件，在南京市民中隨時都會引起強烈的反響。如 1995 年 3 月，當南京市發出為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二期工程捐贈一元錢的倡議後，南京市民紛紛踴躍回應，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參與捐款的市民達到 100 萬人，捐款總額達到 160 餘萬元。2000 年 12 月，當盛島酒店拆移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正覺寺遇難同胞紀念碑而為市民獲悉後，立即引起市民的強烈反對。2002 年 3 月，有關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更名討論，也在市民中引起軒然大波。作為公共記憶場所的紀念館和紀念碑，它們無疑已成為南京市民憑弔緬懷遇難同胞的神聖象徵和市民創傷記憶深處的一種情感寄託。從 1994 年以來，每年 12 月 13 日 10 時南京城上空都會傳來低沉、淒涼、刺耳的鳴笛，現代化的南京都市被整體拉回到 1937 年南京城破家亡的黑色記憶。

但南京大屠殺的黑色記憶不僅僅屬於南京，同時它也是中華民族不可忘卻的歷史創傷。2005 年 3 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治協商委員大會的兩會上，來自江蘇的全國政協委員趙龍（民建江蘇主委）提交提案，呼籲每年 12 月 13 日舉行國家公祭，由國家領導人參與公祭活動，以國家的名義

悼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同時建議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升格為國家級紀念館，並申報「世界文化遺產」。2012年3月，在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趙龍再次提出設立國家公祭日的提案，與此同時，全國人大代表、南京市政協副主席、南京藝術學院院長鄒建平，以人大代表的名義也遞交了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建議案，強烈呼籲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祭日舉行國家公祭。2014年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一致投票通過，將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以國家名義舉行公祭，共同緬懷悼念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以及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中，慘遭侵略者殺戮的死難同胞。2014年12月1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了在南京舉辦的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一萬餘名國內外各界代表參加了公祭儀式。從1994年開始由江蘇省和南京市舉行的悼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儀式，到了2014年第二十一次祭奠之時，南京城市的記憶上升為國家層面的記憶。

當然，南京大屠殺也不應僅僅是中國的記憶，南京大屠殺這一慘痛教訓也應讓全世界人民共同記取。南京大屠殺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一樣，都屬於世界的黑色記憶。2005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決定將每年1月27日設立為「緬懷大屠殺受難者國際紀念日」，這一天在世界許多大都市都舉

行隆重的紀念活動。1996年，廣島和平紀念公園正式成為世界文化遺產，時刻警醒人類社會。2015年10月9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將《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年後，南京大屠殺成為全世界的共同記憶。

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的延伸，從表象來看，是從南京城市記憶，上升到國家記憶，再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但這不僅僅是區域空間的突破，也是對國家民族身分概念的突破，是我們對南京大屠殺認識不斷提升的結果。

四、歷史記憶的反思：衝突與和解

歷史是一面鏡子，我們如何記憶歷史，將決定我們如何迎接未來。在冷戰體制瓦解、東亞政治格局重建和世界一體化進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如何相互理解和尊重過去的歷史、尋求共同記憶，顯然已成為制約中日兩國未來走向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

1980年代以來，日本國內一部分人士以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眼光來看待南京大屠殺，認為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捏造的謊言，是中國人利用的政治工具，將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中陳列的有關日軍殘殺中國人的圖片，解讀為中國的反日政治宣傳，將紀念館視為「開展反日洗腦教育的重要設施」。2002年7月，日本鹿兒島縣議會甚

至通過一項提案，限制日本學生前往中國參觀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2015年，在世界教科文組織將《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後，日本政府對此則進行了猛烈批評，甚至威脅停止交納會員費用。在中國，隨著日本右翼的不斷挑釁，日益強化的南京大屠殺記憶，在民族主義推動下，也不可避免成為民眾對抗和打擊日本右翼的武器。

將南京大屠殺置放到人類文明史的視角去討論，而不僅僅當作中日之間的問題，這也許是尋求創傷記憶和解的前提。「通過大屠殺事件作出的檢討，應該擴大為對各民族都有益的一種具有普世價值的反省。我們歷史的檢討，不僅僅是為了對得起過去的一切受害者，更是為了未來的人類自救。」1997年，著名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在《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中，從人類文明的視角總結南京大屠殺的教訓極具啟發：一是文明本身脆薄如紙，「南京大屠殺應被視為一個警訊：說明人類多麼容易被煽動，容許青少年壓抑善良本性，被塑型成高效率的殺人機器」。二是「把權力全部集中在政府是很危險的——只有未受監督的絕對權力，才會犯下南京大屠殺這種暴行」。第三個也許是最讓人痛心的教訓，「人類心靈竟能輕鬆自在地接受大屠殺，使我們在面對這些不可思議的暴行時，不為所動。南京大屠殺是當時世界媒體的頭版新聞，但是在屠城展開的時候，世界大都站在一邊袖手旁觀」。這

三大教訓應成為人類進行反省的寶貴財富，也應該是我們如何記憶南京大屠殺的出發點。

1980年代之後中日兩國間關於戰爭記憶特別是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爭論日益加劇，引起東亞社會各界的反思。2002年在南京召開的東亞和平論壇上，中日韓三國歷史學者倡議共同編寫三國近現代史，希望這一超越各自民族國家、揭示歷史真相的教科書，能推動兩國年輕人形成共同歷史認識，從而達成東亞和解的目的。2005年，《東亞三國近現代史》在中日韓三國發行，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2012年升級版的《超越國境的東亞近現代史》（上、下冊）也在三國同時發行。在民間不斷推進共同記憶的同時，2006年10月，中日兩國政府也開始組織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經兩國學者的努力，《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於2010年正式完成（2014年中文版出版）。不管是民間學者還是政府所推動的共同研究和編纂，對中日歷史記憶和解（南京大屠殺是指標性的事件）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除了學者們在形成共同記憶方面所進行的努力外，2000年以來，以日本松岡環為首的銘心會和以旅日華僑林伯耀為首的中日友好促進會，一直努力嘗試治療南京大屠殺中戰爭性暴力受害者的精神創傷，他們聘請專業心理醫生，通過與倖存者交談、一起聚餐、旅遊等方式，對部分倖存者進行心理治療。眾所周知，戰爭的陰影並不會隨著

時間的流逝和戰爭經歷者的去逝而主動消失，現實生活中各種因素隨時都有可能在年輕人中重新啟動戰爭記憶，從而有可能導致新衝突的爆發。因此，醫治中日之間的戰爭創傷不僅僅是針對戰爭倖存者和受害者而言的，而更應放大到我們整個社會，特別是年輕人群體。從 2009 年開始到 2013 年，由日本立命館大學的村本邦子教授牽頭，邀請美國加州綜合學院的阿芒德·沃卡思教授（Armand Volkas）和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了三次「撫慰歷史的傷痕」（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工作坊，每次來自日本、中國和韓國等地近 30 名師生，一起參觀戰爭紀念館、聆聽倖存者的記憶、演出戲劇、研討對話等不同活動，大家敞開心扉，交流感受，表達和平追求。參加者從內心中深切感受到了放鬆，徹底丟掉了沉重的歷史包袱，歷史創傷治療並非遙不可及。

當今隨著互聯網、新媒體的出現，人類社會記憶的方式再次發生了巨大變革，「記住一切」成為可能。人類社會特別是中日兩國民眾應一起，不僅要將南京大屠殺這一創傷記憶視為人類過去的共同恥辱，也要將它置換為指引人類未來和平走向的共同財富。人類應從悲慘的歷史中吸取教訓，而不應使之成為仇恨的催化劑。

推廣活動



歡迎瀏覽國史館網站（www.drn.gov.tw），掌握最新活動訊息！